

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

辛文岩

为人民而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是文艺之母。”“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重申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属性,为广大作家在新时代更好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精品奉献人民指明了方向。

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生动谱写时代与人民的新史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回顾过往,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由中国人民共同书写的;立足当下,气象万千的时代画卷是由中国人民共同绘制的。万涓成水,汇流成海。正是因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才得以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在奋斗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彰显了创造历史的火热激情,汇聚起来就是一部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书写这些伟大的创造主体,记录他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是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不断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只有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之树才会枝繁叶茂。新时代的作家要不断地从时代巨变中汲取创作灵感,用多样的笔触描绘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生动实践,表现人民群众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史诗。

文学创作要歌颂人民,刻画出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经

典形象。既然历史和时代是由人民所创造的,那么我们的文学创作就要“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他们有梦想与希望,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新时代的作家要倾听人民的真实心声,用生动的文字把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转化为对人民的美好献词。在对时代和人民的书写中,作家们要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展现人民群众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热情、甘于担当和奉献的高尚情怀以及昂扬奔向新征程的精神风貌。“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新时代作家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按照美的规律造型,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拼搏者、英雄等各类形象,不断丰富经典形象画廊,让读者在这些艺术形象中感受历史的脚步和时代的气象。

文学创作要扎根人民,在深入生活中进行美的发现与创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在新时代,人民生活的广袤大地、人民创造历史的火热实践,正在向每一位作家发出召唤。广大作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近出书斋阁楼,走出方寸天地,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深入生活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做到“身入”“心入”“情入”,把自己

的思想情感与人民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让自己的心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既需要有相关机制的扶持和激励,更需要作家将之视为一种内在的要求和主动的行动。新时代的各个领域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广大作家要主动深入生产建设第一线,主动深入人民生活的现场,抓住那些有意味的细节,把握斑斓多姿的生活色彩。同时,在与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中,扩大自己的胸襟,提升创作的视野,使自己的思想更具穿透力。

文学创作要鼓舞人民,以优秀作品倡导健康文化风尚。现实生活是多元的、复杂的,作家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用精彩的笔墨聚焦那些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用文学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针对一些不如意东西和丑恶的现象,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那样,“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人民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发挥着引领时代风尚、铸就民族魂魄的重要作用。它们不仅留存于书页上,更镌刻在人民的心中,滋养着一代代的读者。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全景式全视角的英雄赞歌

——《跨过鸭绿江》剧本创作思路

余 飞 王乙涵

《跨过鸭绿江》因涉及重大历史事件、领袖人物以及众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相比一般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空间有限、创作难度大,创新难度更大。为了圆满完成这次创作任务,我们共同形成了此次创作的“顶层设计”。

第一是全景式地展现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

除创作层面外,还涉及到忠实还原当时国际关系、国际局势等政治层面的因素。在前期策划和创作的时候,我们和各方专家反复论证过各种方案及可能,包括正面战场如何详略表现,国内抗美援朝运动如何体现,真实的志愿军将领和英雄如何出现以及虚构人物线到底要不要、占多少比例等。最后确定了如下创作思路:以抗美援朝的重大史实为主体,从出兵决策开始,对五大战役作全方位的表現,陆军为主、空军为辅;正面战场为主,后勤运输保障为辅;朝鲜战场为主,国内人民的积极支援为辅。力争多侧面、多角度、全景式地正面展现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全过程。

第二是全视角展现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

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战争,意味着既要表现国家命运、世界格局,领袖的运筹帷幄;也要表现战争场面和英雄人物、英雄事迹。我们的方法是将人物和事件分为战略、战役和战斗三个层面来叙述。



电影《跨过鸭绿江》海报

古诗词之美,现代人“够”得着

黄意明

中国古诗词的文化理想与生命情感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站在今天的时代,如何理解古诗词的内在文化精神,更好地发扬其中体现的永恒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读诗可兼重情感和哲理

就文学经典的诠释而言,一般诠释学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符合论,中国的文艺批评基本上以符合论为主。《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就是著名的“知人论世说”。“知人论世说”对后天的影响很大,它要求理解创作者的原意、作者和文本发生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等要素。

另一种是视界融合论,这种理解较强调阅读者的阅读体会,重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今天我们阅读古诗词,应该兼有符合论和视界融合论两种眼光。

另外,在传统中国的诗论中,比较偏重于诗歌的情感价值,《尚书》说“诗言志”,陆机说“诗缘情”,“志”为情志,“情”为情感,都属于现代所云的情感范畴。今天我们阅读古诗词,还应该兼重情感和哲理两个向度,而不必厚此薄彼。

开阔意境与今人共情

以唐代孟浩然《宿建德江》为例:“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孤独的诗人,漂泊到异乡,远处的暮霭和炊烟缓缓升起,勾起诗人浓浓的乡愁。诗人于是把眼光投向远处的山水,他看到在广阔平原上,

上期“双塔”介绍了第四届茅盾新人奖获得者张二棍,本期刊出另一位获奖者、我省作家同文盛的自叙文章,从中不难看出一位作家探索思考、求变创新的成长之路。

——编者

仔细回忆我的文学生涯,从1995年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一路上总是充满了波折,但二十六年的时间,可以让我顽强地保持一个信念,除了此前毫无道理的自我认同,就是前进途中的一次次哪怕微薄的收获。现在我已经很难回忆起自己是如何开始了第一首诗的写作,而事实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诗歌,我渐渐发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生命固有的,更多时刻,它是对那个固有世界的转述和旁证。

2001年夏天,我在离开家乡小城前夕,曾经写下一些短小的不分行的作品,每篇700到1000字,共20来篇。因为语义连贯,大幅减少了诗歌的跳宕成分,而被我称之为散文。但它没有明确的显见的中心,很少借助实在的形体,贯穿其中的,只是一点若有若无的思绪。此后五六年间,我连续写下了长短不一数百篇散文,直到2010年,才把其中的部分与我婚后所写的一些散文篇目合并,并结集成书,于2011年1月出版,书名《失踪者的旅行》。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在为出书欢欣的同时,我发现了许多问题。整本集子,格局狭小不说,而且时有重复。我有一种从散文的写作中逃离出来的渴望,或者改变自己的写法,以期把更多的、更为宽泛的杂质都纳入我的写作系统。

我从2005年左右试着写了一点小说,但其时间跨度,也持续了五六个百分点。之所以要写小说,一是由于散文与诗在表现手法上的困囿,我需要找到一种更强有力的文体来支撑我的写作,二是我向来认为,一个人在写作的前期更应转益多师,从各种文体中取其精华,方可博采众长,从而达到游刃有余之境。但到2012年上半年暂时停顿小说写作为止,我尚且无法确定,这种兼顾各类文体的写作是好是坏,但我愿意在最终确定一个方向之前,多做些尝试和实践。

我曾经迷恋那种布满了“南方才气”的“灿烂华章”,因为在我的整个身心中,向来缺乏“通向日常之物的绚烂”,即我无法以过多的世象承载我的“表达”,所以自2012年10月28日开始,我才选择了《主观书》这样“枯燥到了极点”的书写。换句话说,求思辨和识认的《主观书》系列作品,正是我的思维“匮乏”的产物。

何谓《主观书》?我设想如此:100万至200万字的“断章”“文字的碎片”“长篇箴言”“寓言”“简短的故事集”“诗”的杂合体。

《主观书》自创作至今,九个多年头过去了,这部融合了我的“全部思考的妄念”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十卷书,其总体规模达到了120万字。业已出版前三卷:《我一无所是》《主观书笔记》《灵魂的赞颂》。

《主观书》之前,我的确写过一些完整性的篇章。不是微言大义,但觉行文慨然,可以叙事滔滔,可以论说滔滔,而在骨子里,我却以为自己正在走入一种限定性,正在与无数的他人混同为一(面向日常生活和历史,强调叙事性和行文的中介、铺陈和承载)。在我的一些注加了“细节”(追求血肉丰满)的,近万字、甚至万字以上的篇章中,我试验过这种书写的完整性。但结论是,它使我通向了被拘束和不自由。

所以,到《主观书》(尤其是最近的两卷书:《变形的灵魂》《之在曲》)这里,我的表达才达到了真正的虔诚如一。有些文字是胡言乱语的产物,有些文字是思维迷茫的产物,当然,更多的部分,出自自我“思维的集中”,它的确是我在“灵感高涨”时的产物。如此一来,我似乎窥到了让书写达于“枯燥和单调”中的“云蒸霞蔚”之状的一个门径。《主观书》也慢慢地有了另一种色彩斑斓的绚烂之感?

在长篇箴言《主观书:孤帆远影》中,我曾经郑重地写下:“我最想在作家身上发现的,是那种不苟同的才华,它恰恰是一个创作者真正的创造力所在。它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审美的独特的才华,具有让我们屏息静听的奇异和陌生性。它不一定需要铺排,但一定有着可以让我们感应到的方向性和所指。它可能不是以我们望向窗外时的那种浩瀚和空茫的目光切入,但它的即便是细小的观察力量也让我们震惊。通过这种观察,我们能够探测到生活底部的碎石,这是一种客观的、乐于与我们共存于宇宙中的碎石。或许这样来表述是正确的:它以碎石作为支撑使我们意识到了一种硬度的发生,而这种硬度,正是艺术并不单纯,传统和顺滑的引力的象征。”

我的书写,于是开始有了新的“拘执”。我把另外的书写法则弃之如敝屣。那曾经被我所质疑,“心怀揣测”的散乱与破碎因其强烈的爆发力受到了我前所未有的青睐。但“灵感的集中和虔诚的表述”可以成为常态吗?结论是否定的。因此,无可回避的,没有爆发力的生活和极度渴求爆发力的写作之间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换句话说,在《主观书》的书写已经开始向着“风格化”奋力迈进的当口,我再度走上了一条犹疑之路。

九年来,《主观书》秉承的是佩索阿、尼采、巴塔耶、本雅明《单行道》、罗扎诺夫、卡夫卡日记、齐奥朗、昌耀不分行的诗、我母亲的无穷絮语的思考路径,或许正因为它太过于强调客观性了,所以会生产无处不在的“思考的裂痕”——因此,即便在作者如我看来,《主观书》的未来也充满各种变数。

我思故我书

闫文盛



《主观书笔记》书影